

边疆考古亮点频现

本报记者 付裕

重要考古遗址发掘成果显著

新疆通天洞遗址考古成果是2020年最值得提起的边疆考古成果之一，它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海拔1810米。“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种类丰富，发现距今8900-13000年的细石器，展现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特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军表示：“乌尔禾地区发现的砾石石器丰富了新疆地区古人类石器技术文化内涵，为探讨远古人类迁徙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外，该遗址还发掘出土了锡青铜管残件、距今5000年左右的黍等重要遗存。”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表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辽西地区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明显，社会内部管理体系和保障体系有力，在对外关系中，战争因素非常突出。骨镞的大量出土，可明显地看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冲突加剧，大型城址和小型聚落的布局均重点强调防御功能。”

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中，西藏洛扎县乡村石棺墓考古工作颇为引人瞩目。“洛扎乡村石棺墓考古学文化面貌同隆子县斗玉乡夏拉木墓地、扎囊县结色沟墓地以及山南雅隆沟零星出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一致，与西藏南部喜马拉雅山麓地带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之间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博馆员赤列次仁表示：“该遗址的发现有助于西藏腹地早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不仅为建立西藏考古学年代框架提供重要资料，而且为这一区域在西藏早期就已经是‘南亚廊道’重要的通道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青海省都兰哈日赛墓地考古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7座、烧祭遗迹9处、殉牲坑2座及堆石遗迹

边疆考古因其地域范围和文化特点而具有独特的价值。2020年，边疆考古亮点尤多。特别是在边疆地区考古新发现、城址与礼制建筑的探索、文化交流与多学科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工作进展。

1处。墓地规模较小，但布局具有一定规律，随葬陶器口沿部存在明显的‘毁器’习俗。”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夏艳平介绍说：“由于‘毁器’习俗是鲜卑墓葬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该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都兰地区吐谷浑文化分布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结合该遗址的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出土器物特点等初步判断该墓地主体年代为7世纪至9世纪中叶。”

“裕民、四麻沟等遗址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尖圜底器、圆底器、片状器组合在我国北方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可能与东西伯利亚地区（贝加尔湖周围）早期文化有交流。”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博物馆研究员胡晓农通过裕民、四麻沟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与调查对阴山山脉东段北麓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现进行研究。此次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为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多元文化内涵提供重要材料。

考古探索城址与礼制建筑

“西周时期吐谷浑王慕容智墓为目前发现和发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兵兵表示：“慕容智墓出土了包括墓志在内的文字材料，还出土了大批随葬品，部分随葬品如木质胡床和床榻，各种典型的丝织物及铁甲冑等，为吐谷浑墓葬考古研究提供了罕见的实物材料。墓葬信息的完整提取，对唐代高等级墓葬葬制的研究及河西其他地区、青海都兰等柴达木东南地区

发现的部分大致同时期墓葬的族属认定提供参考。”

“通过对金上京皇城外南侧、中轴大街中部西侧的建筑遗迹进行的考古勘探，初步了解到金上京遗址皇城南门址通往南城南垣西门址的中轴大街两侧建筑址基本对称分布。此次发掘区东部为一座高台楼阁式建筑遗迹，其西侧区域南北向以长廊分隔，形成不同的居住单元。所揭露的建筑遗迹大致有早晚两期年代差异。”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刘阳表示：“金上京为金王朝的早期都城，使用时间较短，遗存内涵相对单一，是认识近代历史的标杆材料。”

“从磨盘村山城的考古发现入手，经过连续8年的发掘，已经可以初步架构起磨盘村山城始建、使用、废弃、沿用的过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廷对金东夏国南京城进行考古发掘后发现：“根据城内发掘收获，确认遗址内主要包含两期文化遗存，其中晚期遗存属于金末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为东夏国南京城故址。遗址内山城宫殿区、仓储区的发现，为进一步确认该山城为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提供证据。东夏国历史在史书记载很少，该遗址有助于进一步解这一短暂割据政权的兴衰史，对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边疆考古新发现收获颇多

“新疆若羌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是新疆境内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处古代采矿遗址，反映出新疆早期大规模工业生产状态。遗址无论是早期的四坝文化还是晚期的焉耆文化，其采矿技术与秦岭、河西走廊采矿技术均颇为一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先怡衡在对新疆若羌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进行简述时讲道：“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发现古矿坑110余处，可分为古代采矿工具



二道井子M138出土的彩绘陶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捐钱捐物、发展生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术界发挥美术作品的宣传作用和鼓舞力量，用大量的画作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反映在广大基层群众生活中的，便是这些喜闻乐见的年画。



这是一张1950年慰问军属题材的年画，由江西省年画创作出版委员会出版，上海文宝橡皮印刷局承印，定价为四百元。年画上是慰问抗美援朝军烈属的庆祝场景，顶部印有“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八个大字。只见远处走来一群敲锣打鼓的秧歌队，正在燃放鞭炮增加了热闹的氛围。慰问的人群中，有的担着沉甸甸的粮食，有的举着“慰问军烈属”的小红旗，还有的捧着糕点、白酒和猪肉，他们正走向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大门上悬挂着“光荣之家”“参军光荣”的牌匾。大门外，一位老爷爷被慰问的军人紧紧握住双手，另一名工作人员向老奶奶竖着大拇指，不停地夸赞。慰问的热闹场景更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年画展现了当时新农村的新气象，画面色彩丰富，人物表情生动，注重细节的处理，其创造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另一张是“过年不忘志愿军”的宣传年画。这张年画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编印，中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12月出版。这既是一张年画，也是一张农事挂历图。年画的上半部分将一年12个月二十四节气阴历和阳历日期一一对应，同时还分别载明要开展的农事活动，譬如，夏至要“栽水稻割麦子”，寒露要“捡棉花收花生”。年画的下半部分则是一幅农民喜获丰收庆祝新年的场景。屋中五谷丰登、瓜果满筐，喜庆的红灯笼高高悬挂，堂屋正中“翻身不忘毛主席，过年慰问志愿军”的对联展现了年画的主题。妇女们忙着给志愿军做军鞋、缝军衣。大家团坐在一起给前线的子弟兵写信，告诉他们家里的状况，给他们寄去家乡人民的心意，邮袋上“送给最可爱的人”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年画四周一圈以麦穗和棉花作为装饰纹，缺口处上部分是毛主席画像。

据了解，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宋代曾被称为“纸画”，明代则称为“画贴”，清代称作“画片”“画张”“卫画”等，直到清道光二十九年，李光庭的《乡言解颐》一书中始见“年画”一词。年画和春联一样，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一种象征性装饰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这些致敬“最可爱的人”的新年画，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和强大的力量，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年画致敬『最可爱的人』

周小丽



彩绘漆鹿角镇墓兽



彩绘漆鹿角镇墓兽，通高110厘米，兽头高69厘米，底座21-19厘米。藏于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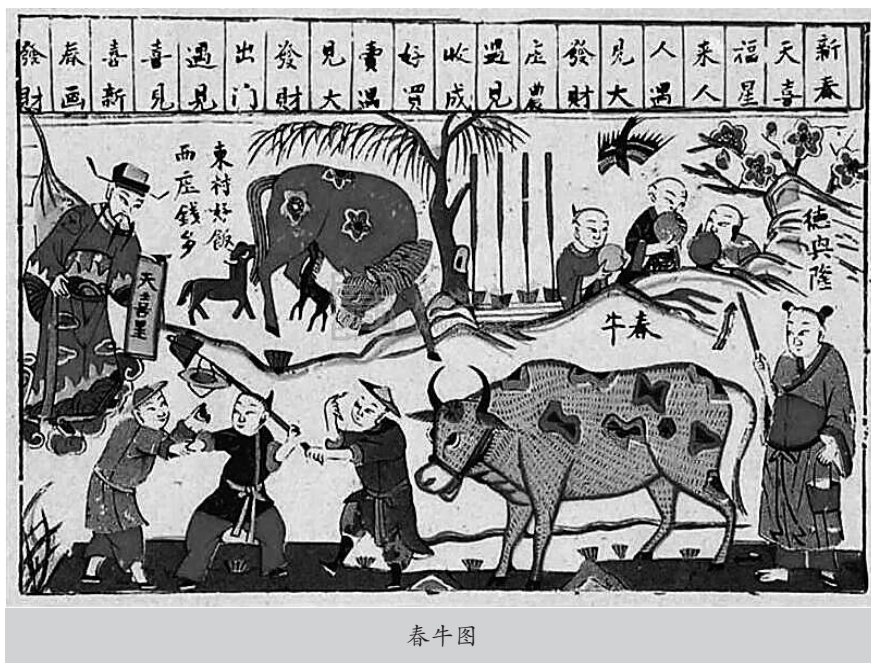
作为楚墓中常见的随葬器物，镇墓兽是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中颇为特别的文物之一。此类器物形象奇特、外形诡谲、形象生动，带有不同凡响的神秘色彩。

出土于荆州江陵藤店一号战国楚墓的彩绘漆鹿角镇墓兽，由鹿角、兽形首、方形底座三部分拼合而成。其为斫木胎，通体髹黑漆，方座上绘朱白彩兽面纹，座上插单面兽头。兽头上双插鹿角，长颈、鼓眼、口吐长舌状。兽身绘朱彩S形卷云纹和菱形纹等。

除楚墓以外，其他战国墓中不多见此种镇墓兽，数量很少，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

杨家埠年画《春牛图》

李喜庆



春牛图

杨家埠年画里的《春牛图》最上方是吉祥语“新春天喜福星来，人人遇见大发财；庄农遇见收成好，买卖遇见大发财；出门遇见喜见喜，新春画发财。”下方分两部分，上层左边是朱袍靴靴乌纱帽的天喜星下凡。中间是两个小马驹正围绕一匹红马吃奶，寓意六畜兴旺；中间印有“东村好饭，西庄钱多”。右边是春燕冬梅下三个农夫吃春饼，一旁还放着四把锄头，这是“四锄三饼”的情节，与“几龙治水”“几牛耕田”“几日得辛”等，均由正月日期的天干或地支支生发而来，人们借此推測年景，是旧时皇历的必备项，也往往是春牛图、灶神画历表的内容。四锄三饼，四锄指正月初四天干逢丁，“丁”字形如锄；三饼指初三天干逢丙。在此寓意冬去春来农耕时间的到来。下层左边是两农家争夺夺权的画面，右边是芒神赶春牛，春牛黄色，芒神持鞭提袋，提醒人们勿误农时，穿一鞋，赤一足，表示年景水旱相当，丰收之兆。春神在牛后，表示节令晚，鞭牛之意在督促农事。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是二十四节气开首第一节气，因此倍受人们重视，风俗之一就是家家户户要贴《春牛图》。以此来祈求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寿年丰、子孙富贵。杨家埠年画里的《春牛

图》就表达了这种意思。还有一种《春牛图》出现在《历书》《地母经》中，前景是春牛和芒神，背景是田地和草木。这类《春牛图》是按着立春之日的天干地支和阴阳五行制成的，农人观者此《春牛图》，便对新的一年的节气一目了然。

传统《春牛图》的春牛来源于土牛，即用土塑成的牛。古时人们在立春前制造土牛，以便地方官在立春举行的迎春大典中，亲自鞭打春牛，以劝农耕，同时象征春耕的开始。春牛身高四尺，头至尾长八尺，尾长一尺二寸。鞭用柳

条，长二尺四寸。

据《清江典》记载：清代每年六月由钦天监按着天干地支、阴阳五行的原理，推算出次年的春牛、芒神的色彩和形象，绘图下发，依次作为各地塑春牛、芒神和绘制《春牛图》的依据。钦天监将六十甲子分为阴年、阳年，甲子年为阳，乙丑年为阴，以此类推。阳年，春牛的口是张开的，尾巴在左边；阴年，春牛的口是闭合的，尾巴在右边。牛头的颜色按当年的天干而定，牛角、耳朵、尾巴的颜色按立春日的天干而定，牛身上的颜色按当年的地支而定，牛颈的颜色按立春日的地支而定。芒神的形象也根据天干的不同，或老者、或青壮年、或童子，芒神高三尺六寸，其衣着服饰的颜色、头上的发髻、站立的位置、甚至其打扮，都要根据天干确定。当其没有穿鞋和裤腿束高时，就代表该年多雨水，农人要做好防涝的准备；当其足穿草鞋时则代表该年干旱，农人要有抗旱蓄水的安排；当其一脚赤足、一脚穿草鞋，则代表该年雨量适中，农人要精心耕作，勿误农时。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牛在农耕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春牛图》为人们喜闻乐见，能够长久不衰。《春牛图》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绘制《春牛图》，将《春牛图》贴在家中，除了能查阅农事节气，还蕴含着人们对风调雨顺、平安吉祥、人寿年丰的祈求。